

當代 香港史學研究

主 編

周佳榮 劉詠聰

中國專題史研究

中國斷代史研究

本地史及外國史研究

協 編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當代 | 香港史學研究

中國專題史研究

中國斷代史研究

本地史及外國史研究

主編

周佳榮 劉詠聰

協編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亞 垣
裝幀設計 陸智昌

書 名 當代香港史學研究
主 編 周佳榮 劉詠聰
協 編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6樓
規 格 大32開(140x203mm)392面
版 次 1994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153-6
© 199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周佳榮 劉詠聰

本書收錄了二十篇探討當代香港史學研究概況的文章，除“導論”一篇外，按照中國專題史、中國斷代史、本地史及外國史研究，分為三輯。

由於集稿之前沒有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各文在範圍、角度等方面不盡相同。大體來說，除兩篇有關本地史研究的文章較為特殊外，主要從1949年起叙，而以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為下限；有的較留意主要學者的研究成果，有的較重視大專院校的發展趨向；各文作者，對香港史學研究的看法也略有出入。全面探索香港的史學研究，此書實為首創，這些差異，或可作為進一步討論的綫索。

作者當中，半數是本港大專院校的教研人員，在各該研究分野中卓有識見；半數是博士、碩士研究生，對新近的研究進展用功至勤。文章風格，有的扼要而深入，有的詳細而全面，各展所長。

雖則各文主題互異，但專題史與斷代史縱橫交錯，有些論著又關係幾個範疇，所以本書各文所述難免有所重複。加上篇幅的限制，編者在盡量不影響文章原意的前提下，作了若干改訂文字和統一格式的工夫。有的文章長達數萬字，並附有論著目錄等，不得不予以刪減，這是要請作者和讀者諒解的。

本書編撰期間，得到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的協助，給予不少方便，文章作者又多是該會的會員，承該會允許，作為本書的協編機構，謹此致謝。本港多位學者曾對編撰工作加以鼓勵和支持，提供資料和訊息，使本書的內容更見全面和充實，在此也一併表示謝意。我們抱着力求客觀和持平的態度，希望本書能夠如實地反映出香港歷史學界的面貌，由於時間倉促及能力所限，相信只是一個起步。如果本書可以引起海內外學界對香港史學的關注和討論，那是我們樂見願聞的。

目錄

前言	周佳榮 劉詠聰	i
----	---------	---

導論——香港史學的成立和展望	周佳榮	1
----------------	-----	---

第一編 中國專題史研究

香港地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	劉詠聰	13
四十年來香港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	劉健明 范家偉	35
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在香港	黃嫣梨	59
近四十年香港地區中國學術思想研究概述	陳志明	75
香港的中國社會史研究（1949—1991）	游子安	102
香港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述評	劉詠聰	124
香港的中國基督教新教史研究	李家駒 黃文江	148

第二編 中國斷代史研究

四十年來香港地區的秦漢史研究	范家偉 李廣健	171
香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	李廣健	187
四十年來香港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劉健明、呂振基	202
近四十年來香港宋史研究概述	鄒兆麟	221
香港明清史學者及其研究動向	李金強	240

香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林啟彥	263
香港學界近年研究民國史的成果·····	陳明錄	289

第三編 本地史及外國史研究

考古學與香港古代史重建·····	鄧聰	305
九十年來之香港史研究·····	蕭國健	332
香港研究西洋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動向·····	徐啟章	343
香港研究日本史及中日關係史的概況·····	黃愈軒	354
香港的東南亞史及海外華人史研究·····	周佳榮	371

作者簡介·····		381
-----------	--	-----

導論—— 香港史學的成立和 展望

周佳榮

(一) 引言

中英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變成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在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下，香港逐步成為中外人士往來會集之所，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地，一百五十年來，是一個既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而又有獨特色彩的華人社會。

當今世上，相信沒有人懷疑香港的經濟成就；不過在文化方面的表現，卻一向不為人所重視，有時甚至被人主觀地予以否定。其中的原因雖然不少，但香港文化界、學術界長期在過客情結的影響下，不熱衷於本身所處的社會事務和文化活動，而當局又缺乏有力的支持和鼓勵，相信是關鍵所在。加上缺乏系統的整理和全面的評介，文物書刊湮沒散失的情況又十分嚴重，即使有珍貴的成果亦鮮為人知，遂更使人以為香港的學術文化無甚可觀。幸而近年來隨着經濟、政治的發展，香港歷史和文化逐漸受人注意，香港地區的史學研究狀況終於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為學術界探研的課題了。^①

專門介紹香港史學研究的論著很少，縱有亦以談論香港學人研

究中國歷史的成績為主，欠缺以香港學界為主體而作出宏觀的探討。羅香林在這方面有開拓性的功勞。他在《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一書中，具體論述十九世紀以來香港的學術文化發展，並對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地位加以肯定。羅氏亦嘗撰寫專文闡揚香港的漢學研究，並根據其發展情況分為三個時期：1842年至1911年為“培植時期”，1912年至1941年為“長成時期”，1945年後為“發揚時期”。^②漢學是研究中國文史哲藝諸學及其有關問題的專門學問，並非專以史學為範圍，至於介紹香港學界研究中國史概況的，則以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五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中黃約瑟、李弘祺等的專文最為詳細。不過，有關的著述仍認為“所謂香港的中國史研究，確切的說，應是在香港發表出版的研究”，^③而其論述的亦僅是中國史的研究問題。

本文擬透過香港史學研究的發展概況，就香港史學研究的特色、探討香港史學研究的方法和態度等幾個主要問題，提出初步的意見，並試圖為香港史學界的局限和所面臨的困難，尋找可能的出路。在1997年回歸中國的大前提下，於中西學術文化交流日趨頻繁的大時代裏，香港的史學界將何去何從，其實是一個並非僅僅限於史學界本身的課題，因為它不但關係香港未來的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關係廿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面貌。

（二）香港史學研究的概況

長久以來，香港在世人的眼中，只是一個重視經濟貿易的商業社會，沒有什麼文化成就可言，甚至被一些人譏為“文化沙漠”。事實上並非如此。早在香港開埠之前，香港地區已有中國傳統的書

院和私塾，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澳門的馬禮遜學校、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先後遷到香港繼續辦學，聖保羅書院、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相繼興辦，使香港成為當時亞洲地區最早發展新式教育的城市，很快便模鑄了中西文化交匯和各展所長的社會特色。

由於西方人士聚居香港，外文書刊和外國新知亦相繼傳入。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便曾到香港搜購資料，然後把他所寫的、近代中國第一本介紹世界史地的名著《海國圖志》，由六十卷增訂為一百卷。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人物洪仁玕，也是在香港居留了一段時間，吸收了他在香港所能得到的新知之後，寫成倡議建設西方式近代國家的《資政新篇》。在十九世紀後期，康有為、孫中山等受香港事物的啟發，走上變法、革命之路，則是中國近代史上人盡皆知的事實。

於此，我們必須指出，十九世紀香港出版的報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影響，其中不少且與史學有關。香港第一份中文刊物——1853年創辦的《遐邇貫珍》，是鴉片戰爭後在華人社會出現的第一份期刊，比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同類型報刊都要早，史學意義和史料價值尤高。在這個刊物上登載的〈西興括論〉等文章，是中文最早有關太平天國起事的記錄和報導；羅森的〈日本日記〉，詳細紀錄作者隨美國海軍提督培理到日本叩關和日本開國的經過，是近代中國人最早的日本見聞，即使在日本近代史上也是極珍貴的史料。至於〈琉球雜記〉，則是最早描寫琉球開國前後社會實況的中文著述。《遐邇貫珍》對於介紹西方史地等知識，尤其不遺餘力，該刊不僅流傳於華人社會，還引鄰近國家如日本的注意。

1874年，寓居香港的著名文士王韜創《循環日報》，是本地第一份由華人獨辦的中文報紙，同時也創近代中國政論報刊的先河。他在旅港期間所寫的宣傳變法自強的文章，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於1882年在香港排印，其中還收錄了不少有關歐洲、亞洲各國歷史、政治問題的論著。他在聖保羅書院畢業生協助下完成的《普法戰紀》，

是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日本軍部將此書刻印流佈，王韜亦成為近代第一個應邀訪問日本的中國學人。王韜在史學方面的成就，與他長期居港和借助香港特殊的條件，固有密切的關係，香港也因此史學方面佔有一定的地位。至於王韜主持的中華印務總局，先後出版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和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等名著，豐富了香港以至中國的出版文化，更不在話下了。

1912年香港大學成立，次年增設文科，聘請賴際熙及區大典兩位太史分別講授中國史學及經學；1927年正式成立中文學系，以賴際熙為系主任；三十年代起，該校鄧志昂中文學院及馮平山中文圖書館相繼落成啓用。凡此，都顯示了香港在踏入二十世紀之後，史學教研工作隨着高等教育的拓展而深化。著名學者許地山、陳寅恪曾經在三十年代後期和四十年代初期擔任港大中文系教席兼系主任，為本地培訓人才作出了貢獻。^④許氏擅長道教史，來港後對本地史產生研究興趣，又積極參與社會文化活動，建樹良多。陳氏則為駐留性質，後因香港淪陷於日軍而逃離，其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原擬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因該館毀於戰火，後改於重慶印行，可以說是香港學界的損失。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部分學者或東渡臺灣，或南下香江，從而使港、臺兩地的中國史學研究得以加強。李金強指出，錢穆、羅香林、簡又文及左舜生四位先後南下香港，從事史學教育與研究，“民國以來傳統史學及新史學之學風，由是得以移植本地”，其中以中國中古史、近代史及香港史三大範疇的研究，最具成績。^⑤私立大專院校如新亞書院、珠海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浸會學院等的出現，為史學教研工作提供了廣闊的天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更為香港史學界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六十年代以來，集結在中大、港大兩所大學名下的，既有遠自歐美的講師教授，也有從臺灣、南洋來港的華人學者，其中著名的

如牟潤孫、嚴耕望、全漢昇、王德昭、陳荆和、饒宗頤等，加上哲學方面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師級的學者，遂使香港在國際學界中享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學者的指導下，培訓了一批本地的學術人才，他們有的留港從事教研工作，有的赴外地升學和發展，使香港成為向海外輸出人才的基地之一，而這些人才在歐美、澳紐、日本、臺灣和東南亞等地，都有卓越的表現。而無論他們身處何方，仍然或多或少與香港學界維持一定的關係，遂使香港史學研究不但兼有中西史學之長，同時具備本身的特色。

香港在史學研究方面的發展，大體上可以沿用羅香林的分期法，但筆者還想指出，以1912年作為第二期的開始，固然由於中國政壇上清朝覆亡、民國成立，而香港大學的成立是更重要的學術上的考慮；以1941年香港淪陷和1945年英國重新佔領作為第二期的結束和第三期的開始，意義實在不大，若以1949年作為分期的界綫，應該更為恰當。換言之，1842年至1911年香港史學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培植時期，但史學成就，仍限於個人和個別項目；1912年至1949年為香港史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香港大學成立後的長成時期，在名家主持下，具備史學規模；1949年以後為香港史學研究的第三階段，由於史家南來及高等教育的擴展，年青學者輩出，是本地化與國際化並駕齊驅的發揚時期。

至於1949年迄今香港的史學研究，尚可細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至1963年，南下史家在艱苦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1963年至1975年，由於中文大學成立，中文教育在高等院校中平分春色，加以華人學者的地位提高，中國歷史研究受到相當的重視；1975年以後，老一輩學者相繼退休，或逝世，或離港，新一代成長，在史學教研崗位上成為中堅，他們一方面與外部學界加強聯繫，一方面則呈現本地化的傾向，香港史研究的興起，便是明顯的例子。

(三) 香港史學研究的特色

如上所述，一百五十年來，香港在史學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今日大概不會有人認為香港地區沒有史學研究，但香港有史學研究，並不等於有具備香港特色的史學研究。

以史學而言，香港在與別不同的環境下，中西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可以兼收並蓄，近年來更成為海峽兩岸史學交流薈萃之地，因此，香港地區的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代中國史學的一個環節，而又同時兼備與歐美、澳洲、日本等外國學界的多邊關係，帶有本土化與多元化的特殊色彩。

但是，正因為這些複雜的特性，使香港的史學研究在歸類上出現困難，以致往往被人忽略。例如中國大陸的機構和學者在編纂中國的史學著作目錄或索引時，只收錄中國大陸和臺灣的論著，香港由於是英國殖民地，她的出版物一般都不被列入中國；相反，臺灣出版的同類目錄或索引，通常也不把香港地區的論著列入。而在介紹外國的研究時，香港又明顯地不是“外國”，結果又不入選，可說是兩邊都落空。

此外，加上香港史學界人數不多，一些長期在港居留和任教的學者又不認為自己是“香港學人”；研究範圍涉及中國、外國和本地歷史，課題太不集中；發表時或用中文，或用外文，有的在本港出版，有的在外地面世，要加以搜集和進行整理，都會遇到相當的困難。事實上，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全面性的綜合和系統性的探討，香港史學研究的成就不但鮮為人知，甚至沒有得到本地學者本身的重視。

有鑑於此，我們對一些概念應作更明確的界定。第一，“香港

史學研究”，是指香港地區的學者所作出的史學研究，他們在本港或外地發表的論著都包括在內。第二，“香港學者”從最狹窄的定義看，是指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學者；在本地接受基本史學訓練而居留外地的，如果與香港學界維持一定的關係，例如回港參加研討會或在香港發表論著，也應列為香港學者；至於長期居留香港和從事教研工作的中國學者，其研究本身和影響所及都已與中國有別，而且是香港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已在香港學人之列，關於這點，其情況就如在香港居留七年的人成為“香港人”一樣；外籍學者長期留港的，甚至主動自認是香港學人。第三，外地學者在香港出版其論著，豐富了香港的學術研究，應該一併計算在內。

總的來說，香港史學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充分運用香港的言論空間，結合中西方的傳統，發揮多元化的優點，並在中國本體的前提下，探求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進路。

（四）香港史學研究與外部學界的關係

百多年來，香港的史學研究的發展雖然受到一些英美學者的影響，在方法、理論和材料上吸收了西方學界的成分，但基本上不是英美學術界的翻版。相反的，由於中國大陸、香港關係密切而微妙，中國大陸學人往還頻密，香港學界之於中國大陸，情況是頗特別的。十九世紀後期，香港在世界觀以及世界史研究方面，曾領先於中國大陸，成績燦然可觀。二十世紀前期，新史學在中國學界興起，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開展以後，香港反而成為學術態度比較保守的文人學士聚集之地；其後由於國民政府禁抑共產黨人，以及日本大舉侵華，香港一度成為中國史學的“防空洞”，不少左翼史家和民族史家來港避難。二十世紀後期，香港則給予民國時期的史學傳統有

接續發展的機會，呈現了與中國大陸學界並不相同的風貌。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香港近數十年來的中國歷史研究，雖然未出現什麼顯著的流派，基本上可說是秉承了中國三十年代以後發展的所謂新史學，在意識系統上接近臺灣多於中國大陸。”^⑥

事實上，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學界對中國大陸的史學研究，絕非不加聞問。大陸學者的論著和他們所整理的史料，在香港曾經大量複印，臺灣和海外學者不少都透過香港了解大陸的研究情形，香港本地的學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並引用了國內的資料和著作。在研究方法及取材內容等方面，香港學者比較接近臺灣，此點固然是事實，而當香港史學界鼎盛的時期，臺灣甚至受到香港的影響。七十年代後期，香港學界青黃不接之際，臺灣學者應聘來港任教的為數頗多，此一局面，延至九十年代始宣告結束。換言之，在九十年代以前，港、臺兩地的史學界關係較深，互有影響。而在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逐漸開放之後，香港成為兩岸學人接觸和交流的中介，近年臺灣學者漸多進入中國大陸訪問，與香港的關係似乎較前疏遠了。

羅香林曾予指出，香港第二期的漢學研究，一方面受到本港中外關係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到廣東學術的感染，因此香港的漢學研究，實富有廣東色彩。^⑦但1949年後來港的學者，以北方人士或受北方學流薰陶的學者為多，故此一時之間，廣東色彩反見淡薄。近數十年來，部分香港學者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地史方面，而有“香港史”這門新學科的發展。

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出現了陳懿勳《香港雜記》（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94年）這類先驅著作，香港史研究卻在最近十數年間才興起，反映了香港學界一向不重視“本身”的問題。今日“香港學”已成為矚目的熱門範疇，香港史研究仍缺乏本地學者熱烈參予，本地學者甚至不曾寫出一部信實可讀的香港史，是很大的損失；同樣，香港與中外各國的關係史，目前也沒有好好的加以研究。

缺乏本地史研究的堅固基礎，而侈談開展香港特色的史學研究，顯然是事倍功半，不切實際的。

（五）香港史學研究的困境及其展望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學術研究沒有得到適當的重視和鼓勵。經濟發達雖然促進現代資訊和交通設施的改進，為研究工作提供了若干方便，但香港學界所面臨的困難，實在相當嚴重。如不加以改善，肯定會妨礙香港文化社會的發展。下列幾個方面，是香港史學遲遲未能發揚光大的關鍵：

第一，香港的大專院校不多。政府撥款的院校資源較豐，但研究費用甚少，私立院校更因條件所限，發展不易。這些大專院校都以教學為主，教師未能專心從事學術研究，本港又缺乏專門的研究機關，大型研究計劃難以開展。

第二，香港缺乏歷史專業刊物。大專院校所出版的學報，均為綜合性質，經常脫期，有些學報且已停辦，歷史學者在本地很少有發表論著的機會，可供發表文章的知識性刊物亦不多，以致若干學者要經常把論著投寄到外地出版。

第三，香港學界沒有足夠的凝聚力。大專院校通常各自為政，很少交流和合作，即有亦以個人性質的活動居多，近年來舉辦的學術研討會顯然以聯絡外地學人為主。目前香港仍沒有全面代表本地學界的學會，合作研究和出版的風氣未開，不能發揮團隊精神，甚至在本地社會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視。

筆者認為，這些困難由來已久，部分原因是本地學者不脫“文人相輕”的風習。往往不能互相尊重，分工合作。輕視別人的研究成果，則綜合整理和客觀評介的工作無從進行，導致資訊貧乏，對

內對外都難作溝通和推廣。幸而隨着時代的改變，年青一輩漸能擺脫門戶之見，加強交流，這方面的難題可以逐漸解決。

雖然香港學界存在不穩定性的因素，但今後的發展大體上是樂觀的，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將可繼續保持和發揮香港史學研究的特色，如果說，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史學研究，連同海外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將滙合而為世界性的“華文史學”，屆時香港史學研究將會受到更大的重視，將可發揮更大的功能。

注釋：

- ① 例如1991年5月25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假香港浸會學院舉辦“四十年來的香港史學”學術交流會，檢討1949年以來香港學者在史學研究方面的成績，曾使用了“香港史學”這一提法。會上發言及討論情形，可參黃媽梨〈“四十年來的香港史學”學術交流會紀要〉，載《明報月刊》1992年2月號。
- ② 羅香林〈香港的漢學研究〉，載《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2年）。
- ③ 黃約瑟〈總論〉二（香港部分），見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I（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34。
- ④ 參閱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
- ⑤ 李金強〈民國史學南移——左舜生生平與香港史學〉，《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3期（1989年）。
- ⑥ 同注③，頁35。
- ⑦ 同注②。